

漂移的灯塔

——在中国的西方文学意义理论

苏冰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漂移的灯塔

——在中国的西方文学意义理论

苏 冰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漂移的灯塔

——在中国的西方文学意义理论

苏冰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校内 邮编 710069 电话 8302590)

新华书店经销 西北工业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开本 6 印张 150 千字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

ISBN 7-5604-1385-4/I · 185 定价：12.00 元

自序

我时常想，人类对于一些注定要面对的基本问题，总要有想法。这些关于问题的想法到了思想家那里，就成了“永恒主题”。像存在、时间和空间、自然、神、无限和有限、生命、战争、革命等，就是这样的永恒主题。从东方到西方，不论是中国，还是印度，或是希腊，有一些头脑不错又爱想问题的人，在人类的少年时期，抢先回答了这些基本问题，于是他们成了各个文化的思想奠基者。中国老子、孔子、庄子、墨子、荀子，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印度的释迦牟尼，这些彪炳史册的哲学大师，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幸运者。倘若他们活在现在，大概或者成了满脑子账单账目的俗人，或者想不俗却再也找不到可以说话的地方——该说的都让前人说完了。想想看，当老子说了“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大巧若拙，大辩若讷”之类的聪明话以后，关于“有无转换”的专利就让他给独占了。后人再说什么也难以更精辟。

不过，即使再也没有成为大师的机会，人们也总要对面对的基本问题发表感想。或许这也是“人权”的一部分。说来说去，后来人的想法和大师们的想法越来越远，所谓的“永恒主题”实际上越来越不那么永恒了。也就是说，就话题来说，太阳底下总有不变的东西；就内容而言，太阳底下没有不变的东西。好像人活着就要吃饭，可吃什么，怎么吃，吃多少，每天吃几次，用什么

家伙吃，在什么地方吃，和谁一块儿吃，吃的同时还干什么，对吃抱有什么想法，目的和态度是什么……从古至今变化大了，而且还要一直变化下去。关于这样的变化，随便挑一个，就可以写一本甚至几本厚书。同样道理，人的服饰、居室、交通、笔墨，哪个没有同样丰富的内容呢。所以说，永恒的主题从来不永恒，其中的变量大于定量。

“意义”也是这样。可以说，“意义”是人类精神中的永恒主题之一。更具体地说，文学理论中的意义问题也是这样。从古至今，人们时常追问：文学作品的意义是什么，来自何处？探究作品的意义，寻找探究的佳法成为众多文学批评和理论活动的目标。可是，关于问题的回答和方法差别挺大。正是出于对永恒话题的好奇，本文的工作开始了。

本文关心传入中国的西方的文学意义理论或意义观。大标题是个比喻。它比较复杂，详见“引论”。

关于副标题所限定的范围也需要说明一下。本文不是研究西方的文学意义理论，而是看看进入了中国的西方意义理论。试想，西方的意义理论浩如烟海，且分散在各种语言的国土上。本人训练不够，英语上学时学过一点儿，是不是到了入门的程度也还难说，其他西语一概不懂。凭这点儿本事，胆子再大也不敢去探险。只能读一读翻译过来的文字。翻译的东西当然不是第一手资料，是不是可靠也得存疑^①，但是翻译的东西有其最大的好处，即使有误译，也能体现国人选择时的用意和误译时的倾向。这既是借口，也是理由。

① 经常可以听到有人议论说哪部译著有误译。有时被议论的是有名的或是发行量颇大的译著。

常听到外国学者谈论中国文化时出语惊人，令人瞠目结舌。不客气地说，对中国文化的皮毛都还看不清。当然有费正清、李约瑟、竹内实等伟大的汉学家，但总是凤毛麟角。我这样说不是褒贬他人，恰恰是看低自己。文化的差异如此巨大，别人难以理解我们，难道我们理解别人就那么轻而易举。相信欧洲人读了我们谈论他们的说法多半要哑然、愕然、惑然、愤然。

要能研究外国的学问，首先必须真懂外语。半瓶子或多半瓶子都不行。急流勇进的结果或是隔靴搔痒，或是贻笑群伦。然而，要想学好外语，学到真懂的程度，谈何容易，除非时间倒转，从少年开始一直有好的外语环境。当然，天才 40 岁以后学外语照样通达。不管他人如何，依我自己的资质和程度，必须将范围定在目前的框框内。所以，本文探究的是翻译过来的西方文论，而非原文，有能力欠缺的原因，也有注意力和态度的原因。

读到一段话，“中国过去 150 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 10 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① 深感见解极为相同。事实上，从大约 10 年前开始，我一直在考虑中国现代文化变迁中的西方影响的问题。大概判断起来，这样的影响广泛、巨大、深远，而且越来越强。读过一篇书讯，介绍一本大概叫做“文化的战争”的书。作者是位美国人。他把现在的世界分成若干种文化，如西欧文化、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印度文化、非洲文化、中国文化、日本文化等。西欧、北美、澳洲属于“西欧文化”。然后他作出了伟大的预言：2010 年将由于文化冲突而爆发中美战争，出于文化类似性，日本将站在中国一边……鄙人实在不敢恭维这种预言的价值。如

^①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自序》，著于 1993 年 8 月 18 日，《中国大历史》第 7 页，三联书店 1997 年。

果说 21 世纪伊斯兰文化和西欧文化可能有比较大的冲突，大概有些道理。我觉得作者根本不懂中国文化，守着地球仪下结论。他应该看到，中国文化是最具包容性的。20 世纪以来，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有过摩擦和冲突，但结果总是西方文化更多更强地进入中国，产生更大的影响，二者融合得更充分更全面。在某种意义上，20 世纪的中国文化史，就是西方文化影响越来越大的历史。

具体到文学理论方面，结论大概也是如此。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像诗话、词话一类的东西，差不多完全消失了。代之而用的是浑身哲学味道的理论性批评。再具体一些，传统文论中的“气”、“意”、“意味”、“风骨”、“意韵”之类的用法也差不多完全消失了。这甚至被批评为“文化失语症”。的确，中国现在的文学意义理论差不多就是西方理论的凑合，哪里有什么纯粹的国货呢。大概可以说，当我们理解了西方的意义理论以后，基本上就理解了中国现代的意义理论。更准确地说，西方文学意义理论进入中国，靠的是机遇和选择。而选择本身就有意义。被选择因而进入的东西，大概以后都要产生影响。

关心中国的问题，偏要舍近求远地观察地球另一边的事业，似乎有点儿奇怪，何不直接研究中国的情况，那岂不便当得多？自诩地辩解，我在这里用的是溯源法，相信只要把那边的事说清楚，中国人马上明白这边的东西来自那边，又有什么异同。日本人看见了中国的铜钱、筷子、图章和围棋，马上晓得了日本的铜钱、筷子、图章和围棋来自中国，但是现在不完全一样。此时，专门的讲解大概多余。这是一个道理。我在文章里，有时也会举出中国的相似例证，但肯定也是随便列举，未经推敲。

这项工作开始于 1994 年，那时定的题目是“意义的流程”。意思是意义是一个过程，而不是固定的东西。后来思路有发展，觉得仅用过程性说明意义理论不够，遂有现在的题目。

当时写了关于从古希腊到 19 世纪、俄国形式主义和新批评的三部分，有 3 万多字。然而，在进度不错的情况下，工作有小变动，特别是决定要把《允诺与恐吓》写完，于是把它停下来了。有人戏称鄙人可以“弹钢琴”，意思是十个手指一块动，同时做多项工作。不知这是表扬还是批评，反正本人好像总是在第一件事的眉目清楚时就开始考虑第二件事，然后在第一件事还没完成的时候开始将第二件事付诸实施，最后不得不回头再把第一件事做完。然而，第二件事到了框架明确时，第三件又浮上心头……就是这样，倒是没有闲着——弄妥了《允诺与恐吓》，编就了汉语课本，办完了另几件杂事，但迟迟到了 1997 年冬才把未完的工作拾起。

在停顿的 2 年多里，尽管没有动笔，但一直在收集资料，该想的问题也一直在考虑。于是，思路有了一些发展。不过，那时因为已经决定要到京都，担心资料不足，所以主要的工作是读资料和把有用的部分输入电脑。1998 年 4 月到了京都。很快就遇到了匪夷所思的怪事——楼上打扫卫生，用水冲地，水下雨一样地漏到我的房间里，电脑受潮不能启动了。谢天谢地，因为有做副本的习惯，文件一点儿也没丢。可是，又是一个多月没有电脑可用。5 月底有了挺好的新电脑，可是它全是日语。安装中文系统，让它工作正常又耗去了一些时间。夏天，小苏来京都度假，心里多了一些事，还要出去旅游，注意力不太集中，虽然思路继续发展。

无论如何，到了秋天，工作终于步入正轨。除了电脑问题得以解决，注意力比较集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慢慢适应了环境。在外国生活，如果不适应，肯定有问题。一旦适应，优越性看得清楚，即生活环境单纯，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要考虑、要顾忌，心里清静得多。从 1996 年开始，常对自己感到不满意。嫌花在乱七八糟的事情上的时间太多，不务正业得厉害，决心“老老实实地做人，本本分分地唱戏”，静心于学理之中地读书、教书

和写书。到了京都以后，终于有了进步或转变。这得益于多方面的推助，心里常存感激，也有诧异。

工作进展顺利，进度正常。很快任务完成多半。然后，1998年12月底到1999年1月初，回西安了一趟。在这两周里，思想有了奇怪的变化。突然间，剩余部分的轮廓完全清楚了，有了几分成竹在胸的感觉。接下来的事好办多了，差不多属于具体的操作。只要一步步地做就行。

现在，全书写就，应该评价一下。结果不乐观。是不是浪费了好题目，没谱儿。题目太好，也就很难，这是次要原因。主观能力不足是主要原因。此外，断断续续地做，思想的连续性不够。加上本来打算“述而不作”，当然没有什么创造。其实，更大的毛病是浮躁。曾读到一位大家的自嘲诗。这位举国闻名的学者、书家批评他自己为文浮躁。读了登时汗颜。门外汉和大家霄壤之别一目了然。大家尚且如此，门外汉更当如何！看来，只是下决心本本分分地唱戏远远不够，还得戒浮戒躁地练功。即使练了白搭，但“重在过程”，也得练习。

这篇序言也写得不合规矩，随随便便。既然正文创见不够，那么就把“创造性”用在这里吧。

不过，该做的事做完了，不管好不好，感到几分轻松。下一件事要做什么呢？已经有了大概的想法。

1999年3月

目 录

自 序

0 引论	(1)
0.1 基本问题和轮廓	(1)
0.2 困难和任务	(6)
0.3 关于背景和范围	(10)
0.4 简单划分文学意义理论	(21)
1 为真理代言	(24)
1.1 神，永恒精神	(24)
1.2 世界，社会，人	(26)
1.3 “修正主义”	(29)
1.4 文学神圣论及代言人地位	(31)
2 头脑或心灵是源泉	(34)
2.1 德行和情感	(35)
2.2 立意、意向、意图	(42)
2.3 潜意识及其他	(51)
3 操作行为的产物	(66)
3.1 操作和技法	(67)
3.2 手段或方式	(69)
3.3 象征的多义性	(76)
4 封闭系统内运作	(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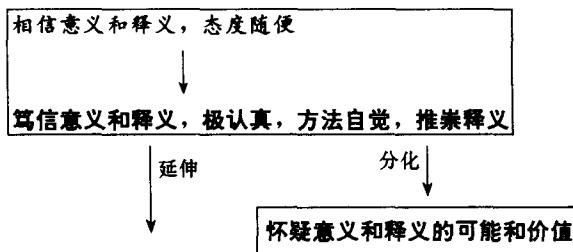
4.1	指向自身	(80)
4.2	形式因素的功力	(91)
4.3	意义生成机制：理论与实践	(96)
4.4	释义批评的方向	(107)
4.5	诗性在歧义和多义	(111)
5	阐释与参与	(115)
5.1	转变	(116)
5.2	接受和阐释的诸因素	(123)
5.3	阐释与多义	(138)
6	无意义和意义消解	(140)
6.1	前卫写作试验	(141)
6.2	后现代倾向	(143)
6.3	消解的黑洞	(146)
7	结语	(151)
7.1	歧义与折衷	(151)
7.2	悬置的用处	(154)
附录：“真实”是价值判断概念而非描述概念		(157)
参考文献		(173)

0 引 论

0.1 基本问题和轮廓

0.1.1 转变、分化和多重涵义

本文观察从古希腊到本世纪末期的西方文学理论中的意义理论或意义观念。这段 20 多个世纪的范畴史可划为两大段，前一段是个不以为然的时代，19 世纪以前在内。后一段是个众说纷纭，迷惑不解的时代。而 20 世纪又可划分为两段。概括而言，第一次转变是由不自觉到自觉，但前提都是相信意义的存在和释义的必要和可能。此后分化出支流或逆流、即由笃信意义和释义到对意义和释义表示怀疑，甚至企图消解或颠覆。用图表示得比较清楚。



本文用了“漂移的灯塔”的比喻，它有多重涵义。其一，文学作品的意义被认为是照亮文学批评之航船前行的灯塔。大伙儿都说，没有灯塔引路的航行是危险和愚蠢的，莫名其妙，压根儿多余。但是灯塔究竟在哪里，各人的看法不同。其二，作品的意义具有浮动性，或曰意义是一种过程性的存在，而非固定不变的东西。即使承认它是一种灯塔，那么也是无法固定的浮标。其三，作品意义是灯塔，但是否需要灯塔，各人意见不一。多数人说灯塔必须，也有一些人断言没有灯塔，或者觉得有没有无所谓，或者说灯塔已然过时，现在需要全新的定位系统。其四，意义理论是灯塔，文学批评需要理论的指引，没有理论引导的航行是盲目的。其五，意义理论变动不居，没有灯塔该有的稳定。

下面将进一步对转变和分化过程略事说明。具体的情况见于各部分。

0.1.2 从不自觉到自觉

早在古希腊时代，哲人们已经把“意义”看作是哲学的范畴。柏拉图说，词语的意义就是它所命名的东西。亚里士多德提出，语词的意义来自事物的本质属性。尽管没有热烈的讨论或争论，但对它的关注是一贯的。大家带着默契形成了共识：文学作品中有它的意义；文学批评必然包括释义和解说；释义批评必然考虑作者的本意。

不过，就整体而言，从古希腊到19世纪的漫长岁月里，意义理论算不上正式的理论。人们心里不约而同地抱有一种不以为然的态度，觉得用心探究意义课题似乎显得有点儿幼稚，“意义是什么”属于常识，没有必要认真关心。这种态度有力地抵消着关于意义课题的兴趣和研讨。然而，不以为然的态度也是一种态度，足以表明一种坚定信念（也是逻辑上的预设前提），即文学作品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东西，即使它够不上是原生存在（如太阳和地

球），那至少也属于次原生物（如城市和水稻）。人生产了它；而人一旦把它生产出来，它就固定不变，就像神的意旨，一旦确定就成为永久的法则一样。换言之，“意义是什么”及其派生问题之所以被当作简单的ABC道理，因为在那些容易相信所谓公理的人看来，意义就是意义，如同夏天就是夏天，城市就是城市，水稻就是水稻。

直到20世纪，意义的重要性和释义的自觉性和科学性才被重新审视。20年代末，里查兹指出，弄懂文学作品的意义既是文学批评的基点，又是它的难点。他说：

文学批评中所有问题的万能钥匙在于回答一些看上去很简单的问题：“什么叫做意义？”“我们在弄懂意义时做了哪些努力？”“我们弄懂的到底是什么？”^①

如果这些问题能够得到令人满意的解答，人们就可以走出诗的迷津，获得打开诗理论房门的钥匙。所以，诗（乃至文学）作品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问题看似简单，实则非常重要，十分关键，几乎算得上是文学批评的前提。意义和释义由此被抬得很高。显然，里查兹对过去的解释表示不满，觉得关于这个“永恒主题”的言谈骨不足论，决心从头做起，用语义学解决问题。

意识到把握意义在文学批评活动中的重要性的并不只里查兹，很多人都用自己的方式提问、考虑、解答“意义是什么”的问题。大家同意，既然阐释是文学批评的当然部分之一，那么获取文学作品的意义便是当然的目的；既然释义是对文学作品进行

^① 里查兹《实用批评》，《20世纪文学评论》（上）第210页。里查兹和奥戈登合著有《意义的意义》。但此作是一般意义理论研究著作，非专对文学现象。

读解和批评的首要工作，那么知道意义究竟是什么，从哪里来的，其构成因素怎样，如何生成，这无疑会对释义有帮助。

把原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当作问题提出和强调，这本身就有意义——里查兹的质疑代表着 20 世纪文学理论在意义问题方面的一种姿态，即寻求对旧有问题的新的解答，于是，在这个被称为“文学批评自觉时代”的世纪，任何使文学批评、文学理论获得自觉意识的企图和尝试触及到意义问题时，就会将批评的自觉具体化为释义的自觉。完全凭着惯性不假思索而想当然地进行阐释的习惯开始改变。开始有一些人在进行释义的批评时认真地考虑一系列先前不被重视甚至不被提出的问题。

比较起来，第二阶段在时间上仅只 100 年，在逻辑上也只占二分之一，但却是本文涉及的主要对象。迄今为止真正有眼光有深度的见解都出在 20 世纪，呈现出各持己见的局面。

0.1.3 从笃信到怀疑

随着释义批评的自觉，随着“意义是什么”从不成为问题变得成了问题，20 世纪出现了意义理论、释义方法探讨的空前发展，空前活跃。大家意识到，意义课题既是基础理论，又是尖端课题。J·汤普金斯总结得好：

所有现代文学批评——不论是注重反应的，精神分析学的，结构主义的，主题研究的，形式主义的——都把意义作为批评性研究的目标。这是因为我们不像古典作家那样，把语言和行动等同起来，而是把语言和意义等同起来。^①

^① J·汤普金斯《读者在历史上：文学反应的演变》，《读者反应批评》第 258 页。

释义的自觉加上意义理论的突进，不能不养成从意义角度把握作品的习惯，“艺术作品中的一切，以及它和外部世界的关系，都可以按符号和意义的说法讨论”。^①这种做法在当今世界为人们所熟悉，大体上算是专业的时尚。众多批评家用批评实践回答释义问题，同时也有众多的理论家、批评家对意义问题进行学理的研究。历久弥新的意义话题到了这个世纪才空前地走红发热。不夸张地说，意义理论是最具 20 世纪特色的理论之一；意义课题则是极富挑战性，也相当时髦，相当新鲜的热门课题。在一些人那里，释义几乎成了文学批评的代名词。仿佛意义是深藏的贵金属，而批评是发掘的利器，打开宝库的锁匙。意义课题成为 20 世纪最引人注目的文学理论课题之一。

尽管 20 世纪里意义课题时髦走红，尽管里查兹等人有改天换地的决心，尽管 20 世纪的多数理论家和前人有代沟，尽管他们互相之间产生了很多很大的分歧，但在一个方面共识甚强，那就是，面对意义问题，第一需要有自觉的意识，想当然不是好办法；第二需要保持对意义确定性的信任。大家相信意义是实在而固定的东西，没有深究其是否存在的必要，就像神的存在是肯定的事实，深究是否存在既缺德又愚蠢。仔细倾听里查兹的提问，发现他张出了改天辟地的架式，脚根却扎在释义目的论、意义固定论的营盘里。在此意义上，里查兹一辈与其说意在改革，毋宁说把意义确定论推向极致。

物极必反似乎是个好规律。在里查兹说那番话的几十年后，终于分化出了怀疑或虚无的倾向。既不相信意义的灯塔是固定的存在，也不打算在批评的航行中寻找什么指示航向的东西。历史再次走了个螺旋，从前人对认真释义的不以为然到里查兹们的郑重

① 穆卡罗夫斯基《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第 75 页。

其事，再到对意义和释义的不以为然。其间微妙的变化值得我们仔细观察。

因此，上面引用的J·汤普金斯的话其实也是质疑。他在质问：意义问题如此走红，释义方法被极度重视以致释义的对象最终被忘掉了，为了释义而释义无异于买椟还珠，这有必要吗，合理吗？

如果说里查兹的呼吁代表了第一次转变，那么J·汤普金斯的质疑总结了分化的前因。目前，分化正在进行，是否成为转变尚需时日。不过，比较起来，占据主流的仍然是意义确定和释义有价值的思想。

随着西方人的关心逐渐增大，中国学术界在最近20年也变得比较关心意义问题了。有些人相当重视这个课题，几乎动情地相信“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发生了重大的‘语言论转向’，在这一转向中，由语言本体论产生的文学的意义问题日益成为当代文艺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意义的提出，使我们对文学的理解，有了一种全新的把握途径。”“艺术永恒的魅力之源就在于艺术的意义世界的无穷生成。意义是个永远开放的可能的世界。”^①也有不少人开始进行深入的探讨，出现了一些假说，而且在经历同样的转变和分化。不过，本文主要关心西方的情况，所以不把这部分当作重点。

0.2 困难和任务

意义问题，准确地说是意义难题，极为棘手，之所以困难，有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意义”这个词语内涵太大，至少现在太大，很容易造

^① 金元浦《意义：文学实现的方式》，《文学评论》1995年4期。